

## 《赋海大观》价值初探\*

踪 凡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赋海大观》(以下简称《大观》),系据国家图书馆所藏上海鸿宝斋清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大观》影印而成。原书书名页注明此为第四次重印,卷首古越守园居士沈祖燕光绪十四年序言中又有“印既竣”一语,则该书之初印时间当在光绪十四年。照常理推测,其编纂亦当在光绪十四年前十馀年间。

对于《大观》的编者,沈序明确交代是春江鸿宝斋书局的主人“庐江太守公”,但姓名不具。据臧励稣《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庐州府下有庐江县,其长官应为县令。此处尊称“太守”,乃虚称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赋海大观》之出版说明指出:“查《上海书业公会史》,得知清光绪十六年(1890)鸿宝斋经理为沈静安,不知其人是否即为本书编者。”<sup>①</sup>态度极为审慎。今按:《上海书业公会史》原名《上海书业的团体》,由陈乃乾撰写,发表在1946年5月上海《大晚报》上。据此文及宋原放注,鸿宝斋经理沈静安热衷于书业公会的组建工作,曾于光绪十六年(1890)同葛直卿、朱槐庐、黄熙庭等租用上海三马路鼎新里房屋为同业办事处;光绪二十六年,四人又组建书业崇德堂公所<sup>②</sup>。又据《上海书业公所职员名单》,沈静安于光绪三十一年被选为公会议董<sup>③</sup>。可见,沈静安至少在1890至1905的十六年间担任鸿宝斋经理。1890年上距光绪十四年鸿宝斋书局初印《大观》仅二年,而且该书在1888至1894年的七年间曾经印制四次,这表明沈静安与此书关系十分密切,即使不是该书主编,起码也曾多次主持过此书的印行。可是我们查询光绪十一年所修《庐江县志》,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九年的二十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赋学文献考”(10BZW061)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赋学文献及其研究”(NCET-08-0629)的阶段性成果。

① 清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全八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影印清光绪十四年鸿宝斋书局石印袖珍本。本文所引《大观》之内容及页码皆以此版本为据。

② 陈乃乾:《上海书业公会史》(宋原放辑注),载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页,529页。

③ 佚名:《上海书业公所职员名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507页。

二年间该县县令无沈姓人士,光绪九年后阙如,民国间亦未曾续补,甚憾。不过,我们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大观》的编纂与印行皆与沈氏家族有直接关系,沈静安很有可能就是此书的主编。当然,如此鸿篇巨制,绝不可能系一人所为,该书《凡例》亦明言:“是编延请文雅,博采广收,裒成巨集,成词林之妙品,炳赋学之巨观。”当是主编延请众多文士分工合作、辛勤搜罗的成果。作序者沈祖燕,字翼孙,萧山(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清光绪年间进士,后官费留学日本,曾做过湖南候补道等官。编有《策学备纂》、《忧盛编》、《案事编》等。国家图书馆古籍编目员将《大观》编者定为沈祖燕并不确切,而出版社定为鸿宝斋主人虽不十分具体,但更为准确。

《大观》虽仅三十二卷,但几乎囊括了此前陈元龙所编《历代赋汇》(以下简称《赋汇》)的全部作品,并且益以有清一代赋作,总数达一万二千余篇。下面拟以《赋汇》为参照,具体探讨《大观》在辑录历代赋(尤其是清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

《赋汇》是迄今为止辑录清以前赋作最为完备的大型文学总集。全书正集一百四十卷,收叙事体物之作,计三千一百四十二篇;外集二十卷,收抒情言志之作,计四百二十三篇;另有逸句二卷,一百七十七篇;补遗二十二卷,四百一十九篇。共计一百八十四卷,收赋四千一百六十一篇(含残篇)。由于该书编成于清代前期,由康熙皇帝御定并且亲为之序,所以对有清一代赋的创作、批评和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大观》比《赋汇》晚出一百八十二年,并且以囊括古今为己任,自然会吸收、借鉴《赋汇》的学术成果。例如《赋汇》卷五十八、五十九“蒐狩”类辑录自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以迄元朱德润《雪猎赋》凡二十一篇作品<sup>①</sup>。《大观》没有“蒐狩”类,但在卷八“典礼”类“田猎”目下也辑录了这二十一篇作品,并且次序完全相同<sup>②</sup>。又如《赋汇》补遗卷十三“书画”类收有十二篇描写图画的赋作,始于宋杨简《心画赋》,终于明李日华《五牛图赋》。《大观》卷十“文学”类“画”目之首也收有这十二篇赋作,篇目、次序与《赋汇》无毫厘之差。很显然,《大观》转录了《赋汇》的相关内容。但《大观》也颇有超越《赋汇》之处,这首先表现在其对清人赋作的搜罗与编录上。

《赋汇》收赋止于明末,显然不能满足清中叶以后文士对当代赋的阅读需要和科举考试的现实要求。《大观》编成于同治光绪年间清代二百余年产生的大部分赋作,为广泛辑录清赋提供了客观条件;加之当时科举考试尚未废除,下层文人对仿习律赋、求取功名尚有热切期待,于是辑录一部集大成式的赋体

①清陈元龙:《历代赋汇》,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43-249页。以下所用版本及标注方式同此,不再出注。

②《赋海大观》第3册,第481-505页。以下标注方式同此,不再出注。

文学总集也有不可小觑的市场需求,该书出版后至少重印过四次,便印证了这种需求。《赋海大观·凡例》称:“是编得赋二万馀首。”仔细核查,实有一万二千馀首;号称“二万馀”,不过是促销手段而已。但即便是一万二千篇,也已达到了《赋汇》的三倍之数,称为“赋海”实不为过。

据陈元龙《历代赋汇总目》,《赋汇》共收赋 4161 篇,其中完整或基本完整者 3984 篇,逸句 177 篇。笔者以《大观》正文中所收赋作为据,编制了《赋海大观总目录》(原书目录阙讹较多,不可据),进而统计出《大观》收赋的实际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天文类,851 篇;天象类,46 篇;地理类,1088 篇;时令类 569 篇;君德类,485 篇;仕进类,281 篇;举贤类,162 篇;典礼类,318 篇;乐律类,502 篇;文学类,1013 篇;武备类,349 篇;人品类,330 篇;性道类,342 篇;仙释类,192 篇;人事类,521 篇;妇女类,150 篇;身体类,105 篇;技艺类,125 篇;农桑类,294 篇;珍宝类,177 篇;宫室类,670 篇;器用类,573 篇;服饰类,168 篇;饮食类,297 篇;飞禽类,480 篇;走兽类,242 篇;水族类,222 篇;虫豸类,258 篇;草类,164 篇;花卉类,710 篇;树木类,398 篇;果实类,183 篇。共计 12265 篇,其中包括“×总”、“前题”、“摘句”和某些有意无意的重出之作(详见下文)。倘若剔除这些“×总”和重出之作,实际收赋约 12000 篇。即便如此,亦可谓前无古人,洋洋大观了。因为《大观》对《赋汇》中的逸句摒弃不取,所以,该书除收录《赋汇》完篇之外(本有 3984 篇,《大观》有少数遗漏),实际增补的清代赋数量应是 8300 篇。如此宏伟的体制,丰富的内容,使其成为收录中国古代赋体文学作品最为该备的一部巨帙。

## 二

《大观》不仅卷帙浩繁、作品完备,在编纂体例上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首先,《大观》合并《赋汇》“正集”、“外集”与“补遗”的内容,集中辑录赋作。陈元龙《赋汇》分为正集、外集、逸句、补遗凡四个部分,同类或同题的赋作散在各处,查检十分不便。《大观》编者为了便于文人士子的查检与仿习,将价值不大的“逸句”删去,而将“正集”、“外集”与“补遗”中的赋作合并在一起,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例如,《赋汇》正集卷二“天象”类收有以“日”为题材的赋四十九篇,始于唐王捧珪《日赋》,终于元邵公任《暘谷赋》;补遗卷一又收有明张位《日方升赋》、明张一桂、田一隼、韩世能《拟日方升赋》各 1 篇、明唐文献《秋日悬清光赋》、唐阙名《骄阳赋》,共六篇。合在一起,《赋汇》共收“日”题赋五十五篇。《大观》则在卷一“天文”类“日”目下,将这五十五篇赋集中编录,免去了读者的翻检之劳。

其次,《大观》的分类也对《赋汇》有所发展与超越。《赋汇》分正、外集编录,正集收录“有裨于经济学问”的赋作,三十类;外集收录“劳人思妇、触景寄怀、哀怨穷愁、放言任达”之作,八类。全书凡三十八类。这种以社会作用之大小

判定文学作品之高下的做法并不足取,并且其外集分类过于琐细,类名也有不当之处。《大观》则不分正、外集,文学观念优于《赋汇》。又将赋类合并为三十二类,显然有精简类目的倾向。例如将《赋汇》的地理、都邑二类合并为地理类,将其典礼、临幸、蒐狩三类合并为典礼类,又将文学、书画二类合并为文学类,将宫殿、屋宇二类合并为宫殿类,将器用、舟车二类合并为舟车类。这些努力都是可取的。

《大观》最大的特色在于,它在三十二大类之下又细分小目,为读者查检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正是其他所有赋集都未能做到的。例如卷二十二“器用”类下分出器用总、车、舟船、槎、航舫、帆、橹声、屏风、帘、镜、扇、杖、鼎、炉、香、灯、烛、风筝、砧、酒器、窑器、木器、度量衡、钟漏、笏、如意、麈尾、杂载,凡二十八目,亦可谓林林总总,品类繁多。这种在类下又分细目的方式,使得数以万计的赋作皆有归属,颇能见出编者的功力和眼光,也便于读者查询。《大观》对类目的划分不仅比《赋汇》更为精细,具体分类也有优于《赋汇》之处。例如《赋汇》外集卷十四是“美丽”类,收录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司马相如《长门赋》《美人赋》、江淹《倡妇自悲赋》、唐曹寅《娇女赋》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其实这些作品并不专咏女子美貌,所以类名“美丽”并不十分恰当。《大观》卷十六改为“妇女”类,已是名实相副;又从《赋汇》外集卷十九“人事”类中抽出描写“妒妇”、“寡妇”、“节妇”的作品并入此类,类下再细分为美色、神女、思妇、才女、烈女、闺阁、贞节凡个子7目,辑录作品更为完备,并且州分部居,有条不紊,为文人士子的查检与仿习提供了很大方便。

第三,《大观》还开创了“x总”和“摘句”两种体例,旨在为文人士子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例如《大观》卷二十四“饮食”类“酒”目,开篇便是《酒总》,辑录“美胜黄封,香逾白堕”、“人醉我醒,以茶当酒”、“李供奉狂饮千觞,刘伯伦醉醒一斗”等十二条丽辞佳句,为文人士子作赋提供参考。“摘句”也是辑录丽辞佳句,不过皆摘自清人赋作,并且是大段摘录。例如卷一“天文”类“天文总”目辑有李锡恭《天衢赋》摘句,摘录该赋“莫逞高谈,侈陈夫青道赤道黄道;畴能稳步,俛视乎大千中千小千”等三段文字;又有阙名《炼石补天赋》摘句,摘有“阴阳烈炭,造化为炉。风姨司扇,霜女捧盂。烛龙运火,屏翳戒途”等7段文字。“摘句”有两种情况:一是原赋过于冗长,但其中有些典雅凝练、属对精工의片断,不忍割舍,便加以摘引;二是已经收录了全赋,编者对其中有些片断特别激赏,于是又重加摘录。如卷一“天文”类收有李锡恭《天衢赋》1篇,接下便是《天衢赋(摘句)》,亦署名李锡恭,而“摘句”中的几句话都可以从上篇赋中查到。

披览《大观》,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同题之作,尤以清代为甚。这些同题之作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古代文人雅士聚会时的彼此唱和,一是生徒日常习作或科举考试的考场作文。尤以第二种数量居多。沈祖燕《赋海大观序》云:“国家功令,除岁、科两试,未尝定制以取士。而词苑名臣之养望木天者,馆阁小课

月一再试之。”可见清代馆阁试赋之频繁。其实,不仅馆阁试赋,制科、召试、翰詹大考、学政考文童生员,以及书院考课,皆有考试之事<sup>①</sup>。王雅南《赋学指南·叙》云:“国朝稽古右文,无体不备。故自胶庠及村塾,莫不以赋学课生徒。”<sup>②</sup>《大观·凡例》明言:“并近今各直省课艺试牍,无论已选未选,概行采入,以期美备。”这种追求“美备”的编纂宗旨使《大观》保存了数以千计的“课艺试牍”之赋,成为清代律赋的宝藏。不过,《大观》并非一味贪多务得,也有删汰、选择的情况。比如律赋作家姚伊宪,其《古芬书屋律赋》载赋二十二篇<sup>③</sup>,《大观》只选录其中十三篇;黄模《寿花堂律赋》载赋十一篇<sup>④</sup>,《大观》只选录其中的四篇。《大观》的铨选与抉择,在当时有效促进了这些律赋名篇的保存与传播,也为下层文士提供了一大批满足应试之需的范文。

### 三

《大观》为我们保存了大约八千三百余篇清代赋作,堪称是清赋之渊薮,对于我们研究清赋、清代文学乃至清代民俗文化皆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人作赋以律赋为多,这是《大观》向我们昭示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如卷一“天文”类“日月”目收有二篇《合璧连珠赋》,“月”目收有二篇《涟漪濯明月赋》,二篇《海上生明月赋》,二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赋》,二篇《行春桥串月赋》,二篇《鸡声茅店月赋》,二篇《停琴仁凉月赋》,皆为清人所作,且皆为律赋;“日”目收有九篇清人的《日长添线赋》,除一篇“摘句”外,其余全为律赋;五篇清人的《黄棉袄赋》,除一篇“摘句”外,其余亦全为律赋。而据全书体例,“摘句”亦大多从律赋中摘引,但因并非完帙,故未标所限之韵。“日”目收有五篇《拟李程日五色赋》,其中四篇标明限韵;“月”目收有九篇《拟谢庄(希夷)月赋》,其中七篇标明限韵;同目收有六篇《月中桂赋》,其中五篇标明限韵。披阅《大观》,就仿佛进入了律赋的海洋。沈祖燕《大观序》论赋云:“或以词胜;或则钩心斗角,以工致胜;或则弹徵歌商,以轻倩胜。虽体格意趣不无异致,而绛树黄华,凡有流露,工力悉敌,选声选色,美矣备矣!”其对律赋对仗工稳、声韵铿锵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可谓推崇备至!《大观》选录了数千篇清人律赋作品,不仅是出于各种考试课赋的需求,也有编者的审美情趣在焉。

从《大观》收赋不难看出,清代赋家把目光投向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因而创作了缤纷多彩、内容丰富的赋作。《大观》三十二类四百八十三子目,除了

①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②(清)余丙照:《增注赋学指南》,《赋话广聚》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清光绪十九年(1893)书业堂刻本,第1页。

③(清)姚伊宪:《古芬书屋律赋》2卷,《琴台正续合刻》本,清刻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

④(清)黄模:《寿花堂律赋》1卷,《琴台正续合刻》本,清刻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



“地理”类“湾”目、“土”目，“岁时”类“漏”目，“人事”类“贫”目、“远行”目、“归思”目等少数子目外，几乎每一目都收录了大量的清赋。如卷一“天文”类共十八目，收赋达八百五十一篇，其中清代赋就有五百七十一篇，十八个子目都有分布；卷二“天象”类共三个子目，收赋四十六篇，其中清赋二十六篇，三个子目都有分布；卷三“地理”类共三十一目，收赋达一千零八十八篇，其中清赋有六百二十一篇，分布在二十九个子目之中。不难看出，清赋的表现题材十分丰富，作品数量也远逾前人。有些子目甚至仅收清人赋作，如卷六“仕进”类收赋二百八十一篇，分为“仕进总”、“尽职”、“辅治”、“清节”、“科第”、“试士”六目，竟然全是清人作品，可见清代文人对仕进的热衷程度。

《大观》不仅彰显了清代文人对赋体文学表现题材的开拓之功，还为我们研究清人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大观》“时令”类“重阳”目收赋三十七篇，其中清代赋多达三十二篇，几乎反映了重阳风俗文化的各个侧面。例如夏思佃《九日登高赋》和姚光宪、王桢的同题之作《登高赋》，是对重阳节登高习俗的反映；阙名的《九日讲孝经赋》，是对重阳敬老文化的表现；汪璧《刘郎不敢题糕字赋》和吴廷珍、施补华的同题之作《题糕赋》，则反映了重阳吃年糕的习俗；而张敦颐的《有菊即重阳赋》，则又有重阳节赏菊活动的描绘。阅读这些作品也仿佛进入了五彩缤纷的民俗天地。

国家图书馆所藏《大观》原书系石印袖珍本，高仅15.1cm，宽仅8.8cm，版框高12.2cm，宽14.6cm，而半叶竟排印二十五行，行六十字，密密麻麻，小于蝇头。所以，该书虽内容浩博，却仅仅印装成四小函，二十八小册，携带十分方便。此书在七年间曾四次印行，可见其营销之广。因其难免有错误频出、字小伤目之弊，所以科举考试废除后，即因失去生存土壤而价同废纸，迅速散亡。今天国内各大图书所存亦不过三四部，且多有残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广其流布，促进研究，甚有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